

“均值回归说”低估了后发追赶国家的增长潜力*

刘培林 贾 坤 邹静娴 申广军

关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今后一个时期的增长前景，有多种多样的看法。普瑞切特和萨默斯提出的“均值回归说”是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一种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今后一个时期的增速很有可能大幅度降低到全球各经济体增速的平均水平上。在深入分析他们的观点后，本文指出他们用各个经济体之间增速差距是否可持续的标准，去判断单个经济体增速是否可持续，存在严重的误导。他们的“均值回归说”最突出的问题是忽视了后发追赶国家在技术水平追赶上发达工业化国家之前所具有的高速追赶潜力。发展中国家在追赶期的增长潜力的主要决定力量并非随机因素驱动的均值回归，而是后发优势这一结构性因素驱动的高速追赶。

关键词：均值回归 后发优势 中国经济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政策含义的话题。围绕这个问题，普瑞切特和萨默斯于2014年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论文《“亚洲欣快症”遇上均值回归》，文章提出了一个“42万亿美元”数量级的问题，即未来20年内（即到2033年时），中国和印度两个经济体各自保持当前经济增速所达到的经济规模，将比经济增速回归全球均值的情景下所达到的经济规模，多出约42万亿美元。^[1]两位学者把认为中印两国经济未来20年延续过去一个时期快速增长的观点，称为“亚洲欣快症”。他们把“euphoria”（欣快症）中

刘培林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Email: peilin.liu@qq.com；贾坤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邹静娴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讲师；申广军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

* 本文是“‘均值回归’并不可靠——长期增长可持续性的深入分析”一文的技术版本[刘培林、贾坤、邹静娴、申广军：“‘均值回归’并不可靠——长期增长可持续性的深入分析”，2017年，《经济研究》工作论文，第WP1172号]。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作者所供职的机构无关。作者感谢何建武、施成杰等人对本文初稿提出的意见，并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1] Pritchett, Lant, Lawrence Summers, “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 NBER Working Paper, No. 20573, 2014.

的“eu”替换成“Asia”，创造出这一新词。该文通过计量分析总结出“国民经济增速回归全球均值，是经济增长唯一的特征化事实”。他们认为，按照这个唯一的特征化事实所反映出来的规律，中国和印度在未来20年的经济增速将大幅放缓。“42万亿美元”更像是一个想象中的泡沫。^[1]

本文同样不认为把过去一个时期的趋势做简单外推，预测未来一个时期甚至很长时期的增长前景的做法在方法论上是可靠的。但是，本文却并不认为普瑞切特和萨默斯所强调的均值回归是无条件成立的，尤其是不认同在后发追赶经济体技术水平收敛到发达工业化经济体之前，均值回归无条件地适用于分析这些后发追赶经济体的增长潜力。

本文的结构安排大致如下。先介绍普瑞切特和萨默斯用来衡量单个经济体增长持续性的判定准则。再阐明该准则虽然可以用于衡量不同经济体经济增速之间差异的持续性，但不适用于判定单个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然后说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水平收敛到工业化国家之前，有潜力保持高于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增速，同时分析为什么普瑞切特和萨默斯的计量分析没能发现这种高增长潜力。最后结论部分讨论了政策含义。

普瑞切特和萨默斯提出的经济增速回归全球均值的判定准则

预测未来的一个最常用的做法是趋势外推。不少经济学家也用这种方法预测未来中印等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那么，这种做法是否可取呢？围绕这个问题，普瑞切特和萨默斯的文章首先做了这样的计量分析：基于PWT8.0的各国经济数据，^[2]以某时点之后一个时期经济增速作为因变量，以该时点之前某个时期的经济增速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他们得到了四个估计量，即相关系数、秩相关系数、回归系数估计值，以及回归拟合优度 R^2 。他们的回归所得到的四个统计量的具体结果见表1。

普瑞切特和萨默斯的文章基于这些分析，给出了他们判断中印经济未来20年内可持续性的标准。“如果我们已知一个国家当前的经济增速，那么对未来最好的

[1] 在报纸专栏和采访中，萨默斯反复强调“信心是最便宜的刺激方式”。这话反过来似乎也意味着，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动摇信心是最便宜的抑制方式。

[2] Feenstra, Robert C., Inklaar Robert and Timmer Marcel,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Penn World Tab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10): 3150–3182, 2015.

预测是什么？极端情况是，如果参数为1则进行完全的趋势外推，如果参数为0则完全不能进行趋势外推。”^[1]由于他们回归分析得到的四个统计量的估计值均为0.3左右，远小于1，所以他们认为“该结果证实了跨期经济增速可持续性较弱”，并由此得出“经济增速回归全球均值是国家间经济增长的唯一特征化事实”的结论。

表1 普瑞切特和萨默斯文章中主要计量分析结果

时期 1	时期 2	相关系数	秩相关系数	回归参数	R ²	样本个数
前后两个10年紧邻的情形						
1950-1960年	1960-1970年	0.363	0.381	0.378	0.132	66
1960-1970年	1970-1980年	0.339	0.342	0.382	0.115	108
1970-1980年	1980-1990年	0.337	0.321	0.323	0.114	142
1980-1990年	1990-2000年	0.361	0.413	0.288	0.130	142
1990-2000年	2000-2010年	0.237	0.289	0.205	0.056	142
前后两个10年间相隔10年的情形						
1950-1960年	1970-1980年	0.079	0.192	0.095	0.006	66
1960-1970年	1980-1990年	0.279	0.312	0.306	0.078	108
1970-1980年	1990-2000年	0.214	0.214	0.163	0.046	142
1980-1990年	2000-2010年	0.206	0.137	0.143	0.043	142
前后两个10年间相隔20年的情形						
1960-1970年	1990-2000年	0.152	0.177	0.152	0.023	108
1970-1980年	2000-2010年	-0.022	0.005	-0.015	0.001	142
前后两个20年紧邻的情形						
1950-1970年	1970-1990年	0.258	0.318	0.343	0.067	70
1960-1980年	1980-2000年	0.459	0.454	0.494	0.211	108
1970-1990年	1990-2010年	0.327	0.325	0.215	0.107	142
前后两个20年间相隔20年的情形						
1950-1970年	1990-2010年	0.047	0.015	0.047	0.002	70

数据来源：Pritchett, Lant, Lawrence Summers, “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 NBER Working Paper, No. 20573, 2014。

普瑞切特和萨默斯提出的准则不能用于判断单个经济体增速可持续性

单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更像一个时间序列问题而非横截面问题，但

[1] Pritchett, Lant, Lawrence Summers, “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 NBER Working Paper, No. 20573, pp. 10-11, 2014.

是普瑞切特和萨默斯却采用后者的分析方法，这其中有两个重要缺陷。

(一) 关于什么的可持续性？

普瑞切特和萨默斯引用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判断准则，源于其1993年的文章。^[1]在1993年的文章中他们利用当前时期增速对滞后时期增速的回归结果，来判断“不同国家间经济增速差距的持续性”。但是，我们下面给出的例子表明，他们所援引的1993年文章的判断准则，不能用于判断“单个国家经济增速的可持续性”。

假设火星上存在A、B、C、D和E五个经济体，在时期1的增长率分别为5%、4%、3%、2%和1%，在时期2的增长率分别为-1%、-2%、-3%、-4%和-5%，如表2所示。可以直观地看出，从时期1到时期2，每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都下降了6个百分点。很显然，火星上五个经济体的“实际情况”是，经济增速在这两个时期完全不可持续。

表2 火星上各经济体增速不可持续（%）

	时期 1	时期 2
A	5	-1
B	4	-2
C	3	-3
D	2	-4
E	1	-5

如表3所示，如果用火星上五个经济体的数据进行普瑞切特和萨默斯提出的回归，得到的四个统计量的值，均等于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按照普瑞切特和萨默斯的判断准则，这种情况下火星上所有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是完全可持续发展的。

表3 火星上五个经济体增速回归的统计量

相关系数	秩相关系数	回归参数	R ²
1	1	1	1

的确，在火星的例子中，从时期1到时期2，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增速差异持续存在。比如，在时期1，A的增速比B、C、D、E分别快1、2、3、4个百分点；在时期2，A的增速仍然比B、C、D、E分别快1、2、3、4个百分点。从这

[1] Easterly, William, Michael Kremer, Lant Pritchett and Lawrence Summers, “Good Policy or Good Luck: Country Growth Performance and Temporary Shock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2(3): 459-83, 1993.

个例子可见，各个经济体之间增速的相对差距的可持续性，和单个经济体自身的增速可持续性，是两个概念。四个统计量均等于1，只代表各个经济体之间增速的相对差距完全可持续，但并不代表各个经济体自身增速完全可持续。即使四个统计量均等于1，也不能像普瑞切特和萨默斯所认为的那样进行趋势外推，去预测单个经济体的未来增速。

从这些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四个统计量的值等于或小于1，这虽然可以作为各个经济体之间增速差异可持续或不可持续的判断标准，却不能作为单个经济体增速可持续或不可持续的判断标准。

（二）增速回归哪个均值？

普瑞切特和萨默斯关于均值回归的文章，除了混淆各经济体之间增速差异可持续概念与单个经济体增速可持续概念以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也未明确交代。按照他们的判断标准，如果上述四个统计量远小于1，就意味着单个经济体增速不可持续，单个经济体的增速会回归某个均值。但究竟回归哪个时期的均值，是回归过去某个时期的均值，还是当前时期的均值，抑或是未来时期的均值，他们并未明确交代。从他们的文章中可以推断，他们认为所有经济体在未来时期的经济增速，将回归到当前时期的均值。因为只有这样理解，才符合他们提出的远高于当前时期增速均值的高增长不可持续的观点。按照他们的“均值回归说”，当前时期经济增速的均值就像一个“黑洞”，单个经济体是无法从中“逃逸”的。

但这与长期的历史经验不一致。众所周知，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的农业社会里，全球各国经济增速不仅都很低，而且，除了气候的影响之外，各国经济增速围绕着一个很低的均值波动。彼时所有经济体都属于马尔萨斯型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长期停滞在600美元（1985年美元）的水平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的很长时期里，各国经济增速服从均值回归的规律，这不无道理。但是，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欧一大批国家的增速发生了普遍阶跃，增速的均值跳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如果“均值回归说”是无条件成立的，那么，农业社会里经济增速均值的“黑洞”根本就是不可“逃逸”的，西欧的工业革命就不会发生。但历史事实是，工业革命在西欧发生了，西欧一大批国家的增速从农业社会增速均值的“黑洞”中“逃逸”出来，跳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了。表4中给出了所有目前可得的不同时间跨度的人均GDP年增长率数据。^[1]从中可见，19

[1] Maddison, Angus, “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http://www.ggdc.net/maddison/oriindex.htm>[2019-12-02].

世纪西欧国家在1820—1940年期间的增速，普遍明显高于之前的几个世纪的水平，1940—2008年的增速又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台阶上。从这些经验证据来看，普瑞切特和萨默斯在其文章中所说的“经济增速回归全球均值，可能是关于国别间经济增速唯一最稳健的、最相关的事实”^[1]，并不能无条件成立，不能无条件地用于分析所有时期的经济史。也就是说，各国经济增速除了受到随机因素（如农业社会的天气因素）影响以外，也会受到重大的结构性因素（如工业革命）的影响。如果说在单纯随机因素作用下“均值回归说”不无道理的话，那么，在重大结构性因素作用下的均值跃升则无法被“均值回归说”加以解释。

表4 人均GDP年均增速（%）

	1500-1600年	1600-1700年	1700-1820年	1820-1940年	1940-2008年
14个西欧小经济体*	-0.03	0.12	0.16	1.16	2.49
澳大利亚	0.00	0.00	0.22	2.09	2.10
奥地利	0.17	0.17	0.17	0.99	2.69
比利时	0.11	0.16	0.12	1.04	2.45
巴西	0.07	0.07	0.28	0.55	2.44
加拿大	0.00	0.07	0.62	1.50	2.30
丹麦	0.17	0.17	0.17	1.17	2.34
芬兰	0.17	0.17	0.17	1.19	3.02
法国	0.15	0.08	0.18	1.06	2.54
德国	0.14	0.14	0.14	1.35	2.00
希腊	0.11	0.09	0.16	1.04	2.98
印度	0.00	0.00	-0.03	0.21	2.18
爱尔兰	0.16	0.15	0.17	1.04	3.31
意大利	0.00	0.00	0.01	0.96	2.59
日本	0.04	0.09	0.13	1.22	3.09
墨西哥	0.06	0.23	0.24	0.75	2.17
荷兰	0.60	0.43	-0.12	0.81	2.43
新西兰	0.00	0.00	0.00	2.32	1.61
挪威	0.09	0.08	0.09	1.36	2.92
葡萄牙	0.20	0.10	0.10	0.47	3.27
西班牙	0.26	0.00	0.14	0.61	3.36
瑞典	0.07	0.07	0.07	1.55	2.31
瑞士	0.17	0.17	0.17	1.49	2.03
土耳其	0.00	0.00	0.06	0.80	2.34
英国	0.31	0.25	0.26	1.17	1.84
美国	0.00	0.28	0.73	1.44	2.22

*14个西欧小经济体包括：安道尔、塞浦路斯、法罗群岛、直布罗陀、格陵兰、格恩西岛、冰岛、马恩岛、泽西岛、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耳他、摩纳哥、圣马力诺。

来源：笔者计算所得。数据来自于以下文章：Maddison, Angus, “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http://www.gdc.net/maddison/oriindex.htm>[2019-12-02]。

[1] Pritchett, Lant, Lawrence Summers, “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 NBER Working Paper, No. 20573, p. 4, 2014.

除了上述西欧国家增速大体同步地跃升到远高于农业社会增速均值这一现象外，西欧国家的技术向北美殖民地扩散所带来的比西欧国家更高的增速，同样不能用“均值回归说”加以解释。依照普瑞切特和萨默斯提出的方法，对表4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假设18世纪初的经济学家根据普瑞切特和萨默斯的逻辑，对1700—1820年的经济增长前景做出预测。他可能会说，考虑到过去两个世纪的经验证据，四个统计量都小于1（见表5的前两行），那么在18世纪将不会出现经济增长奇迹。但事实是，在长达120年的时间里，美国和加拿大的增长速度比增速排在第二梯队的国家高出3~4倍。这再一次表明，普瑞切特和萨默斯的四个回归统计量等于1，并不是单个经济体增速可持续的必要条件；四个统计量远小于1，也不必然意味着单个经济体异乎寻常的高增速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不可持续。类似地，1820—1940年期间西欧国家的技术向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扩散也支撑这两个国家在长达120年的时间里的增速维持在西欧国家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

表5 用更长期的增长数据进行普瑞切特和萨默斯的回归分析得到的统计量

时期 1	时期 2	相关系数	秩相关系数	回归参数	R ²
1500—1600年	1600—1700年	0.67	0.47	0.52	0.45
1600—1700年	1700—1820年	0.15	0.42	0.26	0.02
1700—1820年	1820—1940年	0.21	0.20	0.56	0.04
1820—1940年	1940—2008年	-0.45	-0.42	-0.45	0.20

来源：笔者的计算结果。

如果用1820—2008年的实证结果去验证普瑞切特和萨默斯的增速回归均值假说，就更加困难了。从表5最后一行可以看出，以1820—1940年的增速作为自变量，以1940—2008年的增速作为因变量，进行统计分析，所得到的相关系数、秩相关系数和回归参数这三个统计量均为负值，这表明在1940年之前增长得较快（或较慢）的那些经济体，在1940年之后趋于增长更慢（或更快）。如果说这属于某种形式的均值回归的话，那也不同于普瑞切特和萨默斯的主张。设想在1940年经济学家按照普瑞切特和萨默斯的均值回归的逻辑预测1940—2008年的增速，他会认为，过去120年内增速高于均值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在今后70年内其增长会不可持续，并且其增速会回归均值。但是后来的经济史表明，虽然1820—1940年期间各国经济增速的高低排序和1940—2008年的情形

有很大差异，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前后两个时期的增速排序发生了逆转，但逆转后所形成的各国增速的新均值，却明显高于1820—1940年的水平。这些现象是随机扰动因素驱动均值回归，和技术进步这一结构性因素驱动的均值跃升共同使然，而不能说仅仅是前者使然。

通过上述讨论可知，今天以往的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速均值，并不是从今往后的一个时期经济增速的均值，更不是往后一个时期的增速上限。对于一个给定的经济体而言，从今往后一个时期能否持续高速增长，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诸如技术进步潜力之类的结构性因素，而不是随机因素。

技术水平收敛到发达工业化国家之前后发追赶国家的高增长潜力

从工业革命至今，西方国家一直是国际舞台的中心。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几波发展潮流大大改变了全球财富分布格局，以往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当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未来全球财富分布格局将如何演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增长势头将持续多久，是一个重大的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中心工业化国家和后发追赶国家增长机制的差异。

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原理是持续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1]西方国家处在全球技术前沿。这些国家通过自身试错和研发推动的技术进步所支撑的经济增速相对较低但表现平稳。以美国为例，琼斯提供的数据表明，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美国人均产出年增长率为2%，这个增速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并不高。我们可以把这个每年2%的低而平稳的经济增速，视为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均值。随机因素作用下，工业化国家实际的增速围绕该均值上下小幅度波动。^[2]

与工业化国家情况不同，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如果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其技术追赶驱动的经济增长可能快于工业化国家。^[3]20世纪后半叶，少数东亚经济体已经成功发挥后发优势，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并发展成为成熟的工业化经济体。

[1] Solow, Robert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 65–94, 1956; Romer, Paul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1002–1037, 1986.

[2] Jones, Charles, “The Facts of Economic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142, 2015.

[3] Justin, Lin, “The Latecome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in Martin Andersson and Tobias Axelsson, eds., *Diverse Development Paths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Escape from Pover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43–67.

这些经济体的追赶进程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个特点是，它们经历了一个包含三阶段的倒U型轨迹的追赶周期。^[1]第一阶段，在经济起飞之前增速低于工业化国家。正是这个极低的经济增速使得这些经济体陷入欠发达国家的困境。通过实施合适的政策和制度，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这些经济体进入追赶周期的第二个阶段，经济实现起飞并进而进入高速追赶的“平台期”，通常持续大约30年。最后一个阶段，在技术水平大体上收敛到发达国家之后，追赶型经济体增速逐步回落并收敛于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

另一个特点是，追赶周期第二阶段，即在高速追赶的“平台期”人均收入增长率不仅高达每年近7%~8%，远远高于工业化国家，而且通常持续约30年。凭借后发优势，追赶经济体在高速追赶的“平台期”快速技术追赶带来的效应，抵消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效应。当然，实现快速技术追赶的前提条件是政策和制度的改善。^[2]

在普瑞切特和萨默斯所分析的1950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国别样本中，除了我们提到的发达工业化国家样本，和极少数成功实现追赶的经济体样本之外，还有两个类型的样本。一类是为数不少的贫穷国家由于经济起飞失败而长期陷于贫困陷阱，其经济增长长期停留在很低的水平。另一类发展中国家虽然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起飞，但追赶并不成功，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挫折，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不能充分利用其后发优势。因此，其经济增速也长期停留在很低的水平，尽管这后一类陷于中等收入陷阱水平的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比陷于贫困陷阱的国家高。

需要明确的是，虽然陷于贫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经济增速均值与工业化国家相比，从数值上看是接近的，但是背后的主要原因则不同。

普瑞切特和萨默斯的计量分析没能识别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案例，并且未能识别出高速增长案例所反映的技术追赶这一结构性因素提供的增长动力，而把这种高速增长归结为随机因素之外的“运气”。他们所进行的看似全面的计量分析得出这样的认识，原因有两个。第一，与众多增速较低的贫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样本，以及增速低而稳定的工业化国家样本数量相比，成功追赶的后发经济体

[1] Liu, Peilin, Shen Jia and Xun Zhang, “Catch-up Cycle: A General Equilibrium Framework”,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1(4): 1327-1340, 2017.

[2] World Bank, “The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8; Lin, Justin Yifu, Fang Cai and Zhou Li,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5.

的样本寥寥无几，无疑将成为例外值。而卢卡斯曾经指出，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奇迹应该归因于某种类型的政策和制度，而不能在计量分析中将其视为异常值。^[1]笔者认为，在解释经济增长时，应该持有这样的出发点：机制隐藏于奇迹中（the mechanics is in miracles）。

第二，不同经济体高速增长平台期的起止时点各不相同，取决于政策和制度调整何时推动经济实现起飞和高速追赶，但普瑞切特和萨默斯的计量分析却将所有分析时期的起止点设为同样的时间。

这个部分的分析表明，均值回归不能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发展阶段的国家。对于后发追赶型经济体而言，在技术水平收敛到发达工业化国家之前，具有高速追赶从而也就是高速增长的潜力。当然，这种潜力能否顺利释放，能否充分释放，还取决于体制和政策因素。中国、印度等国家曾经实现高速追赶，其主动力量是这种潜力在体制和政策调整支撑下的顺利释放，而不是随机因素和运气；在技术收敛到发达工业化国家之前仍然具有的高速增长潜力，靠随机因素和运气是无法释放的，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才能释放出来。

中国等后发追赶国家的增长潜力

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未来增长前景怎样？这些国家的繁荣，究竟是“亚洲欣快症”之下想象出来的泡沫，还是可憧憬、可实现的前景？历史经验可以对这个问题提供启示，但不同的观察者得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

罗伯特·福格尔的预测可能是所有对中国和印度21世纪前半叶经济的预测中最为乐观的。他从过去三十年中国劳动力再配置和西欧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推断，跨行业劳动力转移以及通过教育提高劳动力质量，将分别对中国年度GDP增长率贡献约3和6个百分点。因此，从2000年到2040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将每年增长8.4%，到2040年将占世界总产量的40%，几乎是美国的三倍。^[2]

也有人认为中印经济将悲观收场，主要有两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一系列不恰当的宏观政策，或者失败的市场化改革，将导致硬着陆以及金融、财政危机

[1] Lucas, Robert E., "Making a Miracle", *Econometrica*, 61(2): 251-272, 1993.

[2] Fogle, Robert, "Capitalism & Democracy in 2040", *Daedalus*, 136(3): 87-95, 2007; Fogel, Robert, "123,000,000,000,000", *Foreign Policy*, 177: 70-75, 2010.

或全国范围的经济危机。普瑞切特和萨默斯代表了另一类悲观的观点，认为纯然由于“经济增长回归均值”这一反映随机因素的统计规律的作用，无论宏观政策和市场化改革效果如何，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异常快速增长都很难持续。

不可否认，中国和印度的高速增长都有可能放缓^[1]，但主要的原因并非随机因素驱动的均值回归，而是下面两个原因。一是后发优势充分释放、技术水平收敛到工业化国家之后，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并将主要服从均值回归律的支配。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虽然经过了40年的高速追赶，但目前仍然还只是上中等收入国家，尚未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即使中国收入水平在未来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但与美国等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也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印度目前尚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差距更大。这就意味着中印等发展中国家仍然具有较大的追赶空间，进而具有在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速持续高于发达国家平均增速的可能性。^[2]

当然，除此之外，另一个可能导致中印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大幅度减速的原因是，即使后发优势没有得到充分释放，但政策和战略缺陷与体制改革效果不彰，限制了追赶潜力的发挥。实际上，由于不完善的政策和制度，一些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一直深陷中低收入陷阱。^[3]但上述两个原因与“经济增速回归全球均值”一说几乎没有关系。

从更长期的角度和更广大的范围来看，本文相信工业革命创造的成果最终将扩散到全人类。我们赞同卢卡斯的看法：“每个国家迟早都会加入工业革命……所有经济体都将以最富裕经济体同样的速度增长……收入差异将消失（也就是说，恢复到工业革命前的水平）”。^[4]当然，技术扩散的速度，还取决于后发追赶型国家能否消除不利于自身吸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各种障碍。^[5]

（责任编辑：邱静）

[1] Eichengreen, Barry, Donghyun Park and Kwanho Shin, “When Fast-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 for China”, *Asian Economic Paper*, 11(1): 42-87, 2012.

[2] Lin, Justin Yifu, “China’s Potential for Sustained Dynamic Growth”, in Mark Leonard, ed., *China 3.*, London: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 2012.

[3] World Bank, “The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8.

[4] Lucas, Robert E., “Some Macroeconomic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4(1): 159-168, 2000.

[5] Parente, Stephen, Edward C. Prescott, “Barriers to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2(2): 298-321, 1994.